

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¹

李久林^{1, 2}, 储金龙^{2, 3}, 叶家兹^{2, 3}, 刘翰^{2, 3}, 张俊^{2, 3}

(1.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中国江苏南京 210093; 2.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安徽合肥 230022; 3. 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中国安徽合肥 230022)

【摘要】古徽州地区是我国目前传统村落保存面积最大、保护最为完整、具有深厚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区域, 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文章采用历史文献梳理、GIS 空间分析、地统计等方法对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进行解构。传统村落外部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网络状和枝状发展特征, 规模上具有明显的集中性与等级性, 形态上趋于均衡分布。在内部空间序列上, 揭示了传统村落的核心空间、街巷空间、水口空间、滨水空间的组织规律, 发现传统村落的发展深受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结构、天人合一思想、深厚的宗族观念等影响。最后, 基于特征认知, 探讨传统村落空间组织与自然环境、区位环境和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揭示了传统村落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

【关键词】乡村振兴 传统村落 空间演化 核密度估计 驱动机制 古徽州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0-8462(2018)12-0153-13

DOI:10.15957/j.cnki.jjdl.2018.12.020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城乡规划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古徽州”地区是国家文化部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个跨省区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作为徽文化重要载体, 古徽州传统村落和徽派建筑为中外建筑界所叹服。古徽州传统村落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具有重要的保护利用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通过主题词检索的方式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进行检索, 截取1990年代至今的核心期刊文献作为数据源。以主题词“传统村落”作为研究进展归纳的基础数据源, 运用Citespace软件作为关键词再现工具, 从多元、分时、动态视角研究“传统村落”的演化路径(图1)。

“古村落”与“旅游开发”是频度最高的热点词源, 表明传统村落的肌理研究与旅游开发始终是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在探讨传统村落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特色, 形成了传统村落固有的价值体系, 如历史文化价值、美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等^[1-3]。继而传统村落以其本身历史文化底蕴和典型的地域特色, 成为独特的旅游景观资源。相关研究多从旅游动机的推力—引力因素出发, 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 分析旅游者、旅游行为特征, 结合传统村落的价值导向,

¹收稿时间: 2018-04-13; 修回时间: 2018-09-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678001)

作者简介: 李久林(1987—), 男, 安徽桐城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数字城市与规划。

E-mail: ljiu190@163.com

通讯作者: 储金龙(1964—), 男, 安徽潜山人, 博士,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理论与方法。E-mail: jlchu@ahjzu.edu.cn

多划分为遗产型、特色型、保护型等不同类别的村落类型，在探讨旅游开发的模式的同时提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优化路径^[4-7]。关于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研究特点是在实地调研、调查与访谈的基础上，从多元角度分析研究区旅游资源的禀赋、发展态势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某一理论支撑或原则指导下，提出旅游开发的策略或保护发展模式^[8-10]。

梳理既有成果，以空间分布^[11-12]、空间形态^[13-14]组成的“空间分布”知识群组近年来成为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领域，多数成果主要通过地域性个案研究，从地形地貌、坡度坡向、生态资源等自然要素，民族构成、经济社会发展、地域文化等社会人文条件阐释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特征，提出基于全局整体性、系统性的促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对策。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关于传统村落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成果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一是方法上缺乏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形成与发展相关因素的综合考虑，不能完整有力地揭示村落空间分布深层结构的动因。二是当前的研究出发点多集中于历史文化等方面，涉及人文要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作用以及地理环境要素对传统聚落分布的影响研究较少。三是很少学者触及传统村落的内部结构、形态特征、地域特色、具体文化内涵等中微观内容。

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和保护地域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本文在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基于宏观与中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以古徽州传统村落为实证对象，解构其空间格局，通过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解析，揭示古徽州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分布特征、空间组织规律并对影响传统村落空间演化的驱动要素进行阐释，以期在传统村落的区域整体与聚落个体的合理保护开发提供基础性理解与决策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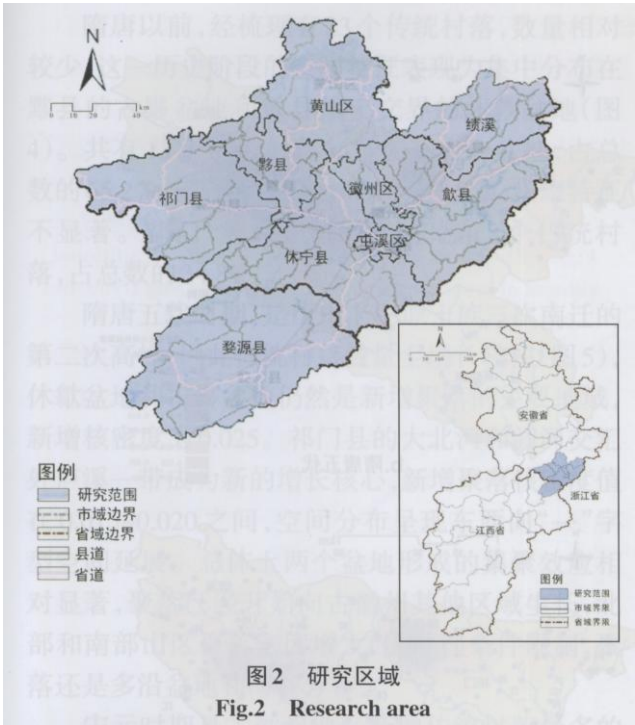
1 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区域概况

本文研究区域为明清时期徽州府所辖范围，辖一府六县（徽州府、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因多次行政边界调整，现今被划分为三个片区，主体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婺源县归属江西省（图2），是徽文化孕育和发展的主要空间。研究区域117° 2' E~118° 3' E, 29° 12' N~30° 3' N, 南北长172km, 现有200万人口，总面积13881km²。

本文的研究基础数据来源于4个方面：①黄山市各县区“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库的土地利用数据（2014年），资料来源于黄山市各县区国土资源局；②婺源县2014年Google-earth影像（分辨率2m），利用GIS软件对所获得的影像数据进行人工目视解译，获得婺源县乡村聚落斑块矢量数据，矢量数据的轮廓是以整个村庄建设用地边界为准；③黄山市与婺源县30m分辨率DEM数据，来源于地理数据云网站（<http://www.gscloud.cn/>）；④不同年间县志、方志、族谱、《安徽舆图表说》及相关县区统计

年鉴等。



1.2 研究方法

1.2.1 历史文献法

对各阶段徽州县志、方志以及各类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确定传统村落数量特征，总结古徽州地区各时期传统聚落演变历程。基于经典文献研究，可以明晰以往传统村落历史演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本研究提供相关基础支撑。

1.2.2 GIS 空间分析法

GIS 以其强大的空间信息分析功能，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展，本研究将各时期传统村落坐标导入 ArcGIS10.2 与古徽州地区高程数据进行叠加，依托 ArcGIS 的数据处理功能、空间分析功能和直观图形输出功能对古徽州的聚落数量特征、规模特征和形态特征进行分析。由于其基本原理相对成熟、常用功能的稳定性，方法过程不予赘述，本文主要利用空间叠加分析、邻近距离分析和空间句法模型，具体实现过程参见相关文献^[18]。

1.2.3 地统计方法

核密度估计方法(kerneldensityestimation, KDE)是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中应用最广泛的非参数估计方法。KDE 以每个样本点 $i(x, y)$ 的位置为中心，通过核密度函数计算每个样本点在指定范围内（半径为 h 的圆）各个网格单元的密度贡献值，距中心处样本点距离越近密度越大，随着距离衰减，到范围边缘处密度为 0。对区域内每一个样本点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计算，将相同位置处的密度进行叠加，得到要素在整个区域的分布密度^[19]。假定 $X_1, \dots, X_n$ 从分布密度函数为 f 的总体中抽取的独立同分布样，估计 f 在某点 x 处的值 $f(x)$ 为：

$$f_n(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式中:K (•) 称为核函数;h 为带宽, 且 h>0; (X-X_i) 表示估计点 X 到样本点及处的距离。

2 区域视角下的外部空间格局

2.1 时间序列上传统村落空间过程

从区域基质上看, 传统村落可以视为古徽州地缘文化单元本底上的点状要素, 点状要素的分布规律一般呈现随机性、集聚性或均匀性特征。本节运用 ArcGIS 邻近距离分析方法, 计算各个时期最邻近距离, 估算传统村落在古徽州地域单元上紧邻程度, 从时间序列上分析地域范围内传统村落的分布类型, 从宏观视角解构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分布格局 (表 1)。

表 1 不同时期古徽州传统村落最邻近距离

Tab.1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of ancient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different history periods

历史时期	新增聚落最邻近 距离平均值 (km)	全部聚落最邻近 距离平均值 (km)
隋朝以前	—	11.37
隋唐五代	6.30	5.51
宋元	5.43	3.87
明	8.32	3.51
清	20.61	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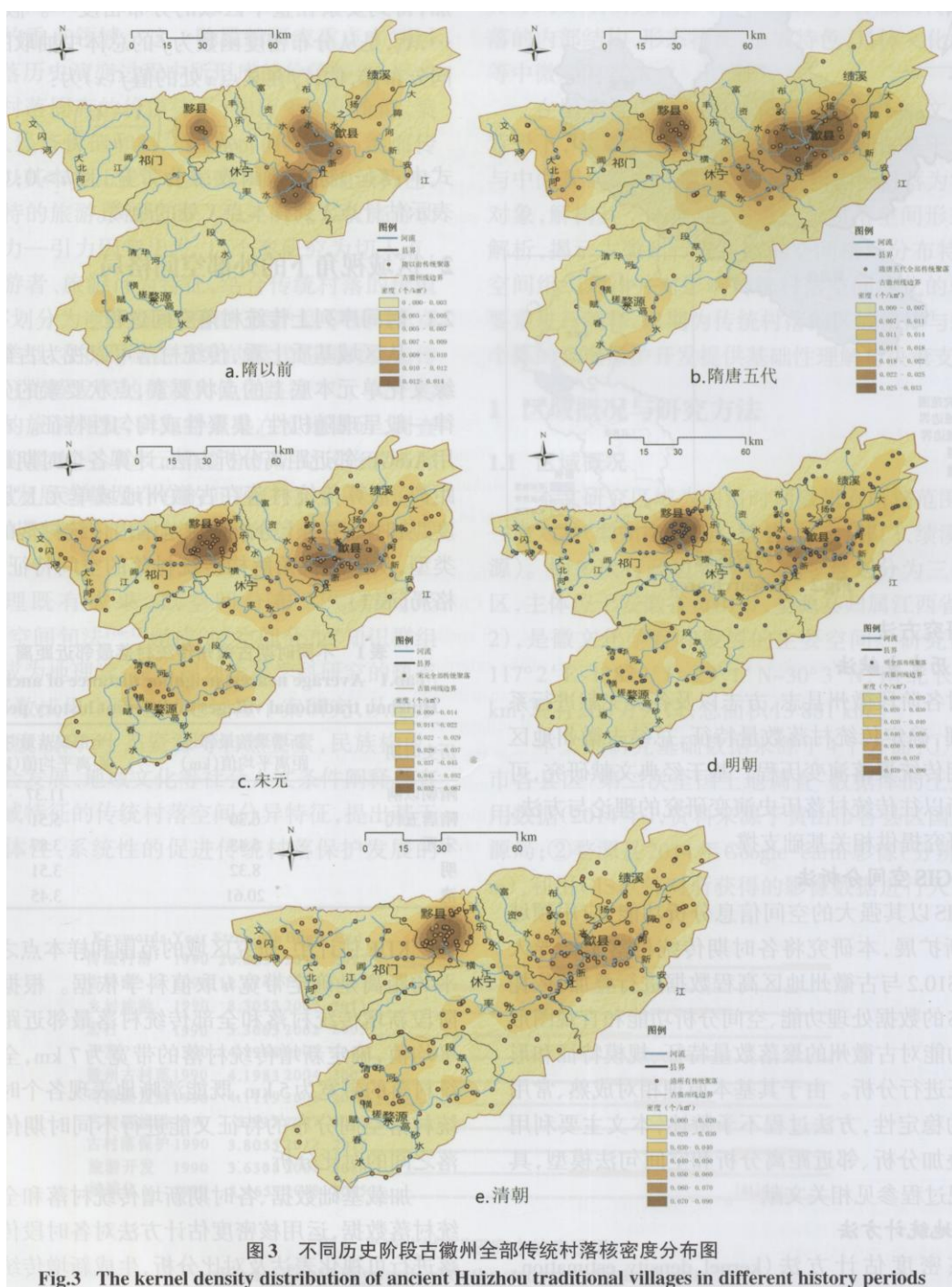
KDE 估计中, 研究区域的范围和样本点之间的平均距离是确定带宽&取值科学依据。根据不同阶段新增传统村落和全部传统村落最邻近距离的平均值, 确定新增传统村落的带宽为 7km, 全部传统村落的带宽为 5km, 既能清晰地表现各个时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特征又能进行不同时期传统村落之间的对比分析。

加载基础数据、各时期新增传统村落和全部传统村落数据, 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对各时段传统村落进行可视化表达及对比分析, 生成新增传统村落和全部传统村落的核密度曲面。将新增传统村落核密度曲面和全部村落核密度曲面基于不同历史段采用自然断裂法分为 7 级, 绘制各时期古徽州传统村落核密度分布图 (图 3)。

核密度估计法能够较好解释空间聚集的程度, 总体而言现今古徽州的 9 个区县当中传统村落的分布形成 2 个相对较高的密度地区, 分别是歙县、黟县。古徽州传统村落大致经历四种分布格局的演变: 隋以前以古黟盆地和休歙盆地为核心的盆地集聚分布态势。隋唐时期新增传统村落已不再局限延两盆地扩展, 开始向婺源和祁门等地的山涧谷地扩进, 整个隋唐时期新增聚落普遍呈现沿新安江、鄱阳湖流域下游和盆地集聚分布, 集聚核心仍然在古黟盆地和休歙盆地。宋元时期新增传统村落虽仍然以休歙二县为主, 不过新增聚落已呈星罗棋布的态势并快速增长, 沿主要水系两侧大范围带状空间分布, 奠定了古徽州传统村落的基本格局。明清时期古徽州传统村落进一步扩展, 婺源、祁门、绩溪也形成了新的集聚核心, 呈现稳定增长的带状、多点集聚空间分布特征, 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趋于稳定。

隋唐以前, 经梳理有 23 个传统村落, 数量相对较少, 这一历史阶段的空间特征表现为集中分布在黟县的古黟盆地和歙县休

宁交界的休歙盆地（图 4）。共有 15 个传统村落分布在这两个盆地，占总数的 65.2%，核密度分别为 0.010 和 0.014，集聚特征不显著。祁门、婺源和绩溪零星分布 8 个传统村落，占总数的 34.8%。



隋唐五代时期，是历史上中原士族三次南迁的第二次高峰，因此传统村落数量上增长较快（图 5），休歙盆地和古黟盆地仍然是新增聚落的主要地域，新增核密度为 0.025。祁门县的大北河和阊河交汇处芦溪一带成为新的增长核心，新增聚落核密度值在 0.015~0.020 之间，空间分布呈现东西向“一”字型空间延展。总体上两个盆地形成的集聚效应相对显著，聚落已经开始向古徽州其他区域生长，北部和南部山区聚落密度增大，受地理条件限制，聚落还是多沿盆地和河谷分布。

宋元时期是古徽州地区新增传统村落最多的时期，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迎来人口向古徽州迁移的最高峰，聚落空间分布范围不再局限于盆地、河谷，开始向整个古徽州地域拓展。宋元时期新增传统村落主要分布休歙盆地、古黟盆地、祁门县祁门镇和婺源紫阳镇周边，其中以黟县新增聚落核密度最大，核密度为 0.039。其他三处次级增长聚集区都有着在县治附近集聚的特点，新增核密度在 0.026~0.030 之间，空间分布呈现“一心多点”的以各县县治为中心扩散态势。整体上看聚落分布已显现出星罗棋布的格局，且沿主要水系两侧大范围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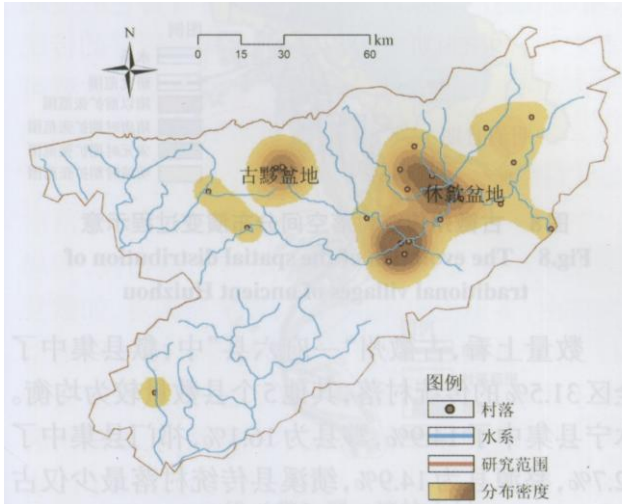


图4 隋以前古徽州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
Fig.4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ancient Huizhou before the Sui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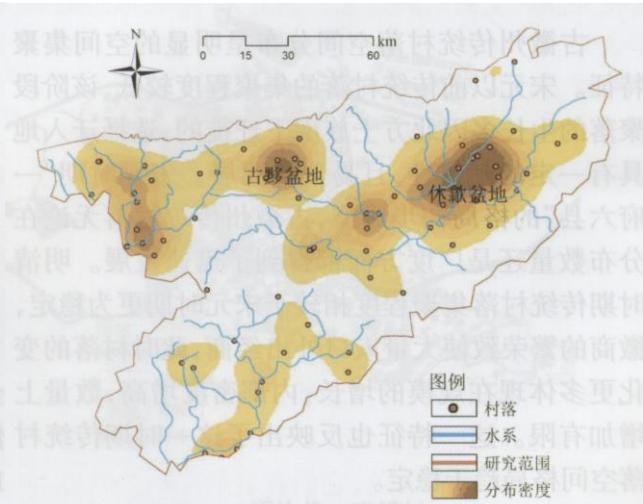


图5 隋唐时期古徽州传统村落的分布特征
Fig.5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ancient Huizhou of Sui-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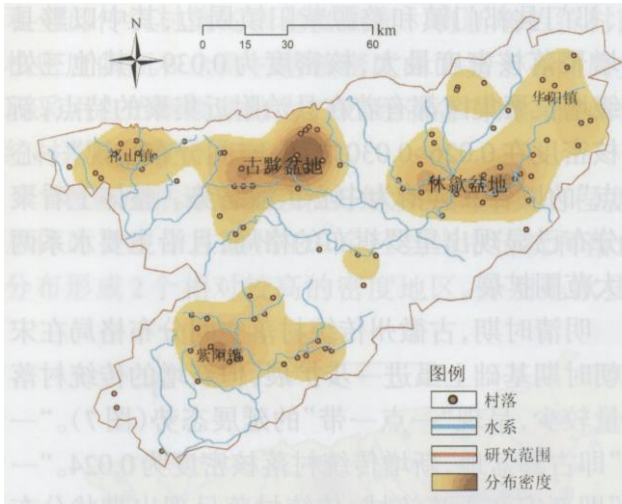


图6 宋元时期古徽州新增传统村落分布模式
Fig.6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newly added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ancient Huizhou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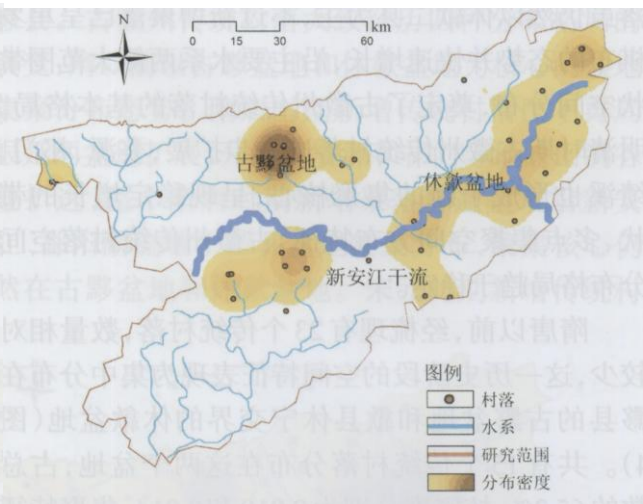


图7 明清时期古徽州新增传统村落的分布模式
Fig.7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newly added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ancient Huizho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明清时期，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在宋元朝时期基础上虽进一步扩展，但新增的传统村落数量较少，呈现“一点一

带”的延展态势（图 7）。“一点”即古黟盆地，新增传统村落核密度为 0.024。“一带”即新安江干流流域，传统村落呈现出带状分布的特征。

受徽商经济发展，明清时期是古徽州地区发展的鼎盛时期，传统村落总体的空间分布上看，新增聚落增长较为明显的为古黟盆地，其他区域新增聚落较少，传统聚落空间格局迈向稳定发展。历经多次历史演变，古黟盆地与休歙盆地仍然是传统村落最集聚的区域，但分布更广且趋向于均匀。除了这两个传统集聚区之外，其他各县以县治为中心分布特征明显，形成“多核”的态势。各集聚区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呈面状分布。与此同时，传统村落也已延伸到主要水系流域的支流，部分聚落逆水而上进入深山，原先鲜有分布的五龙山山脉区域也出现了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整体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水系两侧、带状多点的空间分布格局。

2.2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

通过对各时期传统村落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表 2），发现古徽州传统村落的数量变化呈现如下特征：传统村落新增速度与历史上中原士族三次南迁过程相一致，聚落密度迅速稠密，到明晚期，古徽州地域格局基本奠定，传统村落趋向稳定巩固发展态势，新增聚落较少。

表 2 有记载的传统村落数量演化表
Tab.2 The amount chang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on rec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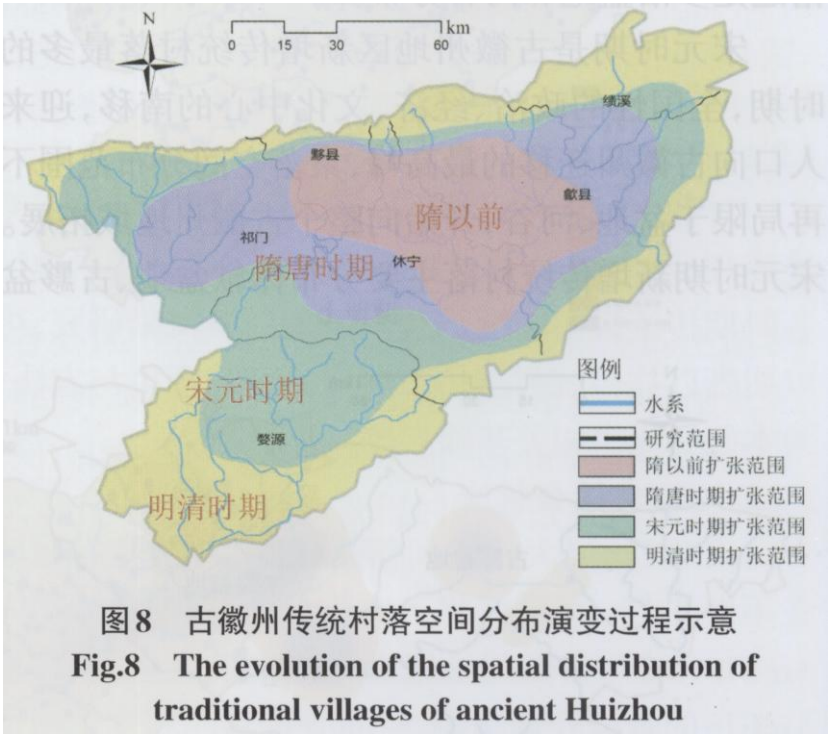
历史时期	传统村落数量（个）	新增传统村落数量（个）	传统村落密度（个/万 km ² ）
先秦	4	4	3.36
秦汉	18	14	15.13
魏晋南北朝	23	5	19.34
隋唐五代	98	75	83.39
宋	188	90	158.06
元	199	11	167.31
明	242	43	203.46
清	249	7	209.35

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宋元以前传统村落的集聚程度较低，该阶段聚落的生长多因北方士族南下迁徙的，选择迁入地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且易集群而居。宋元时期“一府六县”的格局初步成型，古徽州传统村落无论在分布数量还是广度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清时期传统村落集聚程度相较于宋元时期更为稳定，徽商的繁荣致使大量人口外出经商，此时村落的变化更多体现在规模的增长，内部密度增高，数量上增加有限。这一特征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传统村落空间格局趋于稳定。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结构上轴向延伸、圈层扩展特征显著，在广袤的地域单元上整体存在中心向边缘，由古黟盆地、休歙盆地沿新安江流域和鄱阳湖盆地向下流和边缘延伸，并同时向西北、西南的婺源县、东北的绩溪县圈层外扩的态势（图 8）。此外，传统村落在东北—西南方向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具有一定的渐变性。主要源于古徽州中东部地形以盆地、洼地为主，聚落受其制约较小，而在黟县北部和祁门等地，地形主要以岗地和低山丘陵为主，受地形条件的制约，传统村落布局分散，规模较小，其形态多为不规则团块状。

数量上看，古徽州“一府六县”中，歙县集中了全区 31.5%的传统村落，其他 5 个县数量较为均衡。休宁县集中了 14.9%，

黟县为 16.1%，祁门县集中了 12.7%，婺源县为 14.9%，绩溪县传统村落最少仅占总数的 10%。歙县之所以传统村落分布最多，是因为古歙县所辖地域范围最广且地处古歙盆地；此外，歙县一直是徽州府衙所在地，是整个古徽州的政治、文化中心，因而能集聚更多聚落。



3 空间序列视角下内部空间组织

3.1 空间布局形态

由于地形上的天然屏障，古徽州地区成为历史上中原士族规避战乱的重要栖息地。南迁人口在徽州地区建立了早期的移民安置点，改变原有的人口构成。随着人口的繁衍增长，原有的栖息地呈现饱和状态，宗族组织的裂变促成了人口析出，使得析出人口在地域内二次迁移，并建立了新的聚落。形成了古徽州传统村落集居与扩散的基本模式并在自身发展演变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形成不同类型的聚落平面形态（图9）。

① 散居型：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因山就势，分散布局；其二是与当时的佃仆制度有关。前者因为地形复杂、气候特殊、安全堪舆、交通闭塞等地形最容易形成散居型聚落。如休宁县黄村位于山区中，聚落包括南北两个组团，有一条古道连接，组团没有等级区分，规模均较小。后者是关于当时的佃仆制度，受传统等级制度影响，中原世家仆从随迁来此，佃仆居住的房屋必须处于聚落的外围，形成一主一从两个组团，这样的群居者的生活的环境称为“庄”，如歙县的蕃村、瞻淇村等。

② 组团型：平面形态大多呈不规则的多边形，规模相近。这种布局形式的传统村落，用地紧凑，住宅安排集中，方便人们生活，有着较强封闭性。根据绩溪县志的记载，组团型传统村落占全县集居型传统村落的 80%以上。

③ 线（带）型：多分布于山麓、谷底或河畔。古徽州地处山区，山麓位于地势较高的坡地，可以避免洪水的侵扰，又可以俯瞰田畴；山谷间多有涧溪流过，便于生产生活。这两种地形都是孕育线状聚落的主要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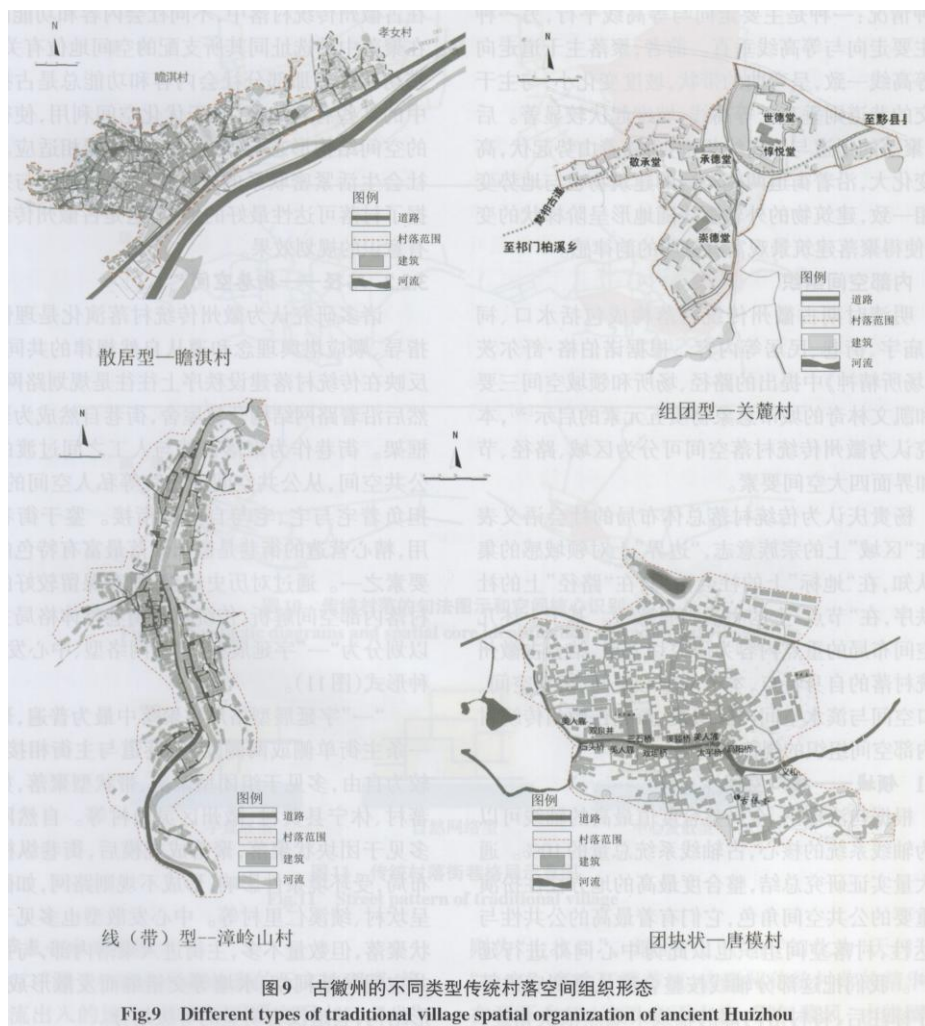


图9 古徽州的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空间组织形态
Fig.9 Different typ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ancient Huizhou

④ 团块型:是古徽州丘陵山地区集居聚落的一种主要形态,一般呈不规则多边形,主要存在于盆、谷地中,这种布局紧凑,占地少,封闭性强。比较规则的团块型聚落,内部往往伴有方格状道路结构。

⑤ 阶梯型:聚落坐落于山坡之上,随着地势的变化多作层级分布。这种聚落布局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情况:一 1 种是主要走向与等高线平行,另一种是主要走向与等高线垂直。前者,聚落主干道走向与等高线一致,呈弯曲的带状,坡度变化小,与主干相交的巷道则垂直于等高线,坡度起伏较显著。后者,聚落的干道与等高线相垂直,随着山势起伏,高程变化大,沿着街道两侧布局的建筑物也与地势变化相一致,建筑物的外轮廓线随地形呈阶梯状的变化,使得聚落建筑景观富有鲜明的韵律感。

3.2 内部空间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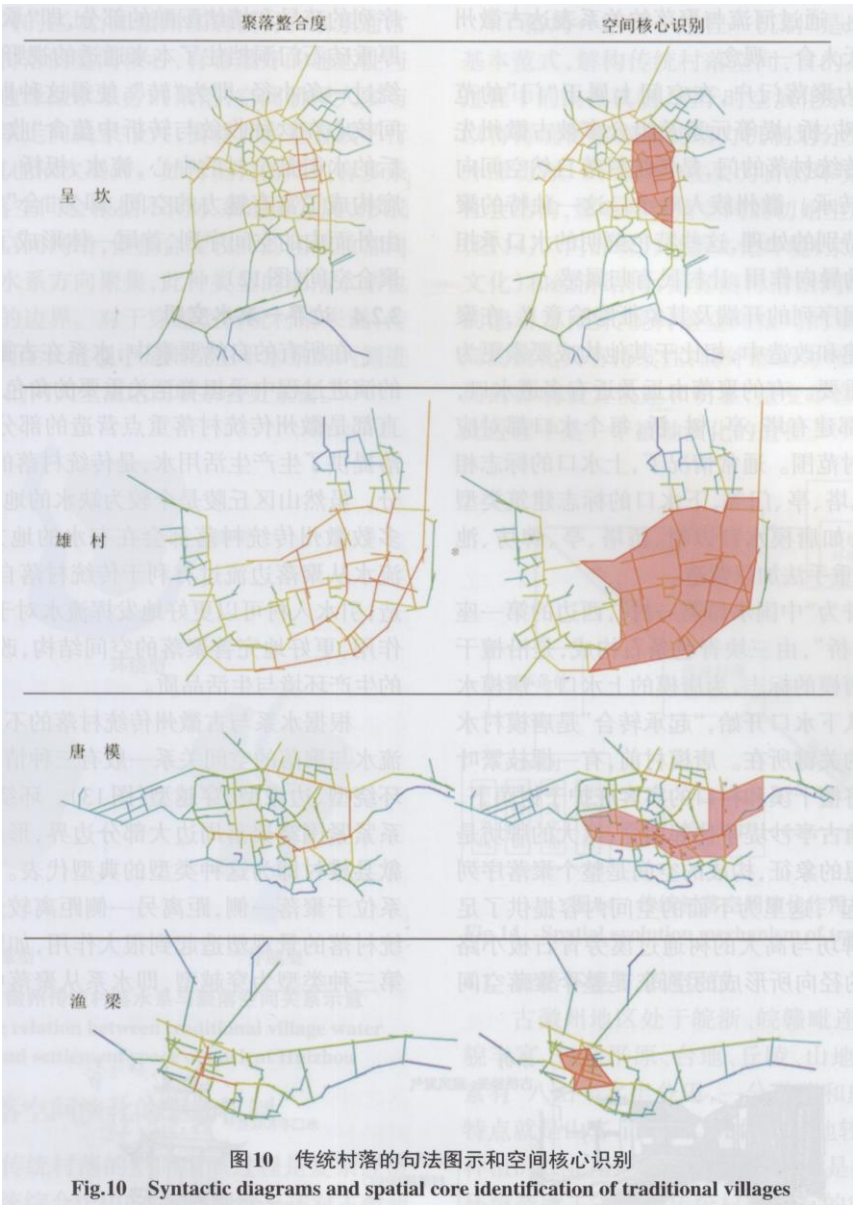
明清时期古徽州传统村落构成包括水口、祠堂、庙宇、街巷、民居等内容。根据诺伯格·舒尔茨在《场所精神》中提出的路径、场所和领域空间三要素和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物质五元素的启示^[20],本研究认为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可分为区域、路径、节点和界面四大空间要素。

杨贵庆认为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的社会语义表征在“区域”上的宗族意志,“边界”上对领域感的集体认知,在“地标”上的社会治理,在“路径”上的社会秩序,在“节点”上的生活归属感^[21]。基于上述几个空间布局的重点内容为研究切入点,结合古徽州传统村落的自身特点,本节从核心空间、街巷空间、水口空间与滨水空间内容出发,探究古徽州传统村落内部空间组织

的规律性特征。

3.2.1 领域——核心空间

根据句法理论，全局整合度值最高的轴线可以视为轴线系统的核心，占轴线系统总量的 10%。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总结，整合度最高的地方往往扮演着重要的公共空间角色，它们有着最高的公共性与可达性，村落空间组织也以此为中心向外进行延展^[22]。我们把这部分轴线按整合度从高到底进行排序标注后，将村落内部的轴线末端点依次相连，得到图中所围成的红色区域，即为聚落的核心空间（图 10）。



超过半数的祠堂都分布在传统村落的核心空间内，虽然有的聚落祠堂分布比较分散，但是大多数仍然聚集在各自聚落识别的空间核心内，并且其句法视角下的可理解度也是最高的。古徽州传统村落的主要街道和聚落的空间核心具有较高的重合度，那些通行较为频繁的街巷多位于空间核心处，或者与空间核心相连。

由于宗族祠堂在核心空间上的聚集，使得传统村落空间组织形态呈现内向的布局特征。较“深”的空间结构制约了对外关系，把村内的各项活动限制在聚落内部，将聚落空间刻上宗法制度的印记。在古徽州传统村落中，不同社会内容和功能的建筑在聚落中的选址同其所支配的空间地位有关，生活密切相关的那部分社会内容和功能总是占据聚落中的某些有利地位，利于优化空间利用，使得相应的空间结构形态与社会组织和功能相适应。主导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公共性活动的祠堂与宗族占据了村落可达性最好的地方，这是古徽州传统村落有意识的规划效果。

3.2.2 路径—街巷空间

诸多研究认为徽州传统村落演化是理性秩序指导、顺应堪輿理念和遵从自然规律的共同引导。反映在传统村落建设秩序上往往是规划路网先行，然后沿着路网结构营建屋舍，街巷自然成为聚落的框架。街巷作为聚落自然与人工之间过渡的人工公共空间，从公共空间到宅院等私人空间的承接，担负着宅与宅、宅与自然的衔接。鉴于街巷的作用，精心营造的街巷是徽州聚落最富有特色的空间要素之一。通过对历史风貌、遗存保留较好的传统村落内部空间解析，传统村落街巷整体格局主要可以划分为“一”字延展型、自然网络型、中心发散型3种形式（图11）。



“一”字延展型格局在聚落中最为普遍，聚落沿一条主街单侧或两侧发展，巷道与主街相接，布局较为自由，多见于组团型聚落、带状型聚落，如歙县蕃村、休宁县黄村、徽州区灵山村等。自然网络型多见于团块状聚落，聚落成规模后，街巷纵横交错布局，受环境条件影响，形成不规则路网，如徽州区呈坎村、绩溪仁里村等。中心发散型也多见于团块状聚落，但数量不多，主街进入聚落内部，与主要公共空间包括祠堂、水塘等交错继而发散形成，成扇形结构，巷道没有明显的等级划分。

3.2.3 节点—水口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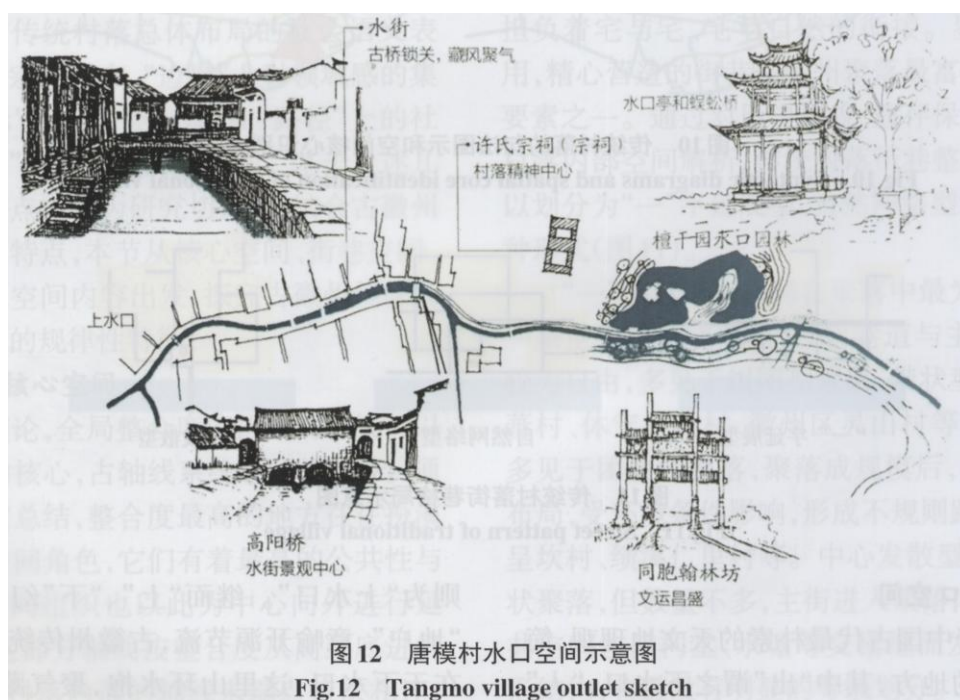
“水口”源于中国古代最朴素的天文地理观，简言之水流出入的地方，其中“出”谓之下水口，“入”则为“上水口”。继而“上”、“下”幻化为“天门”和“地户”，意喻开源节流，古徽州传统村落的精华更在于下水口，这里山环水抱，聚气藏风，才能留住水，留住财气。通过河流与聚落的关系表达古徽州先民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

水口作为聚落门户，在空间上属于“门”的范畴。亭、塘、树、桥、堤等元素及组合多被古徽州先民用来象征传统村落的门，是传统村落自然空间向人工空间的转承。徽州族人对水口这一独特的聚落空间做了特别的处理，这些特色鲜明的水口承担了聚落空间的导向作用，让村民有归属感。

作为空间序列的开端及其象征隐喻意义，在聚落环境的构建和改造中，相比于其他构成要素更为复杂且更加重要。有的聚落由远及近有多道水口，每一道水口都建有塔、亭、树、桥，每个水口都对应着相应的辐射范围。通常情况下，上水口的标志

相对简单，多见塔、亭、门等，下水口的标志建筑类型则丰富很多，如唐模水口以树、桥塔、亭、牌坊、池塘、园林等多重手法加以营造。

唐模被誉为“中国水口第一村”，西边的第一座桥俗称“石头桥”，由三块青色条石构成，是沿檀干溪上游进入唐模的标志，为唐模的上水口。唐模水口精华则是从下水口开始，“起承转合”是唐模村水口空间组织的关键所在。唐模村前，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槐荫树将檀干溪和村口的宾客庇护于树荫下，一座三层八角古孕沙堤孕比邻而立，巨大的牌坊是家法礼制思想的象征，构成的空间是整个聚落序列的开端，即“起”，这里为下面的空间内容提供了足够的暗示。牌坊与高大的树通过溪旁青石板小路到达小西湖的径向所形成的空间，是整个聚落空间序列的疏导和情绪酝酿的部分，即“承”。高阳桥的厚重砖石门洞挡住了本来通透的视野，引导人们须绕过一个水街，即为“转”，使得这种即将到来的空间核心在这种收敛与转折中蕴含“收蓄瑞气”。最后的水街是全村的中心，流水、板桥、民宅、水街檐廊构成了富有魅力的空间，即为“合”，这一完整的由外而内的空间序列，首尾一体形成了藏风聚气的聚合空间（图 12）。



3.2.4 边界—滨水空间

在所有的自然要素中，水系在古徽州传统村落的演进过程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滨水空间一直都是徽州传统村落重点营造的部分。流水为聚落提供了生产生活用水，是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山区丘陵是个较为缺水的地方，但是绝大多数徽州传统村落都会在有水的地方选址布局。流水从聚落边流过有利于传统村落自然环境的营造，引水入村可以更好地发挥流水对于空间的控制作用，更好地完善聚落的空间结构，改善传统村落的生产环境与生活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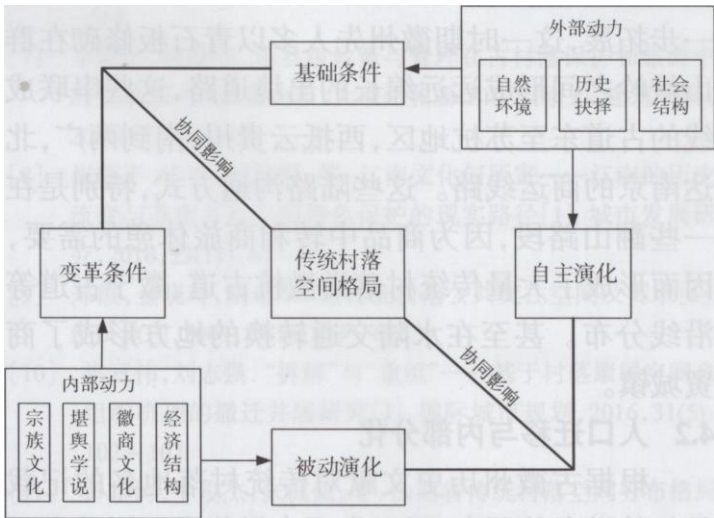
根据水系与古徽州传统村落的不同位置关系，流水与聚落的空间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况，可以分为环绕型、边缘型、穿越型（图 13）。环绕型水系即水系紧紧围绕聚落周边大部分边界，形成围合之势，歙县雄村即为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边缘型指水系位于聚落一侧，距离另一侧距离较远，通常对传统村落的景观塑造起到很大作用，如黟县南屏村。第三种类型为穿越型，即水系从聚落中穿过，将聚落分割为不同的区域，如徽州唐模村。水系通常会经过传统村落的空间核心，有着最好的通达性与开敞性。在边缘型水系旁的聚落，空间肌理大多与其毗邻的水系走向关系很大，街巷大多垂直或平行于水系，建筑也依次展开。如传统村落周边有多条水系，则聚落空间会根据不同水系走向发展，形成不同朝向的空间网络，但整合度较高的区域通常向聚

落内主要水系方向聚集，此种类型的聚落水系也会成为天然的边界。对于穿越型传统村落来说，传统村落在空间生长过程中是围绕主干水系的两侧进行延展，临岸的两大生活组团联系会更紧密。



4 传统村落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

古徽州传统村落的空间组织过程是复杂经济社会演进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根据上述对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的解构，能够高度凝练传统村落基本特征：①村落分布沿江平原呈网络发展，丘陵山区呈枝状发展。其分布特点深受地理环境影响。②在外向经济和强大的宗族文化影响下，传统村落在演进过程中更加注重内部空间治理，市镇数量发育相对缓慢，规模较小。而村落受宗族繁衍、家族商帮的支持往往规模较大，同时类型丰富。③堪輿学说指导下与自然环境相互调适体现个体的独特性。古徽州传统村落在选址建设过程中，几乎“无村不卜”，现存各大宗谱大量记载了各族始迁的聚居点即“卜居”及宗族繁衍的内容和过程。



“格局—结构—过程—机制”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解构传统村落空间，目的是探寻其演化过程中的内在机制，基于时空演化系统的复杂性可以将传统村落发展的动力机制划分为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外部动力主要为自然环境、历史抉择和社会结构，影响着村落空间的初始生成和格局奠定（图 14）。内部动力包括文化环境（宗族、堪舆、徽商文化）和经济结构，是促使村落空间形态组织发展的能动力，是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基础，对空间格局的演化具有持续性；而外部动力则对村落空间格局的影响较为快速和明显，是变革性影响，聚落在此过程中是一个被动演化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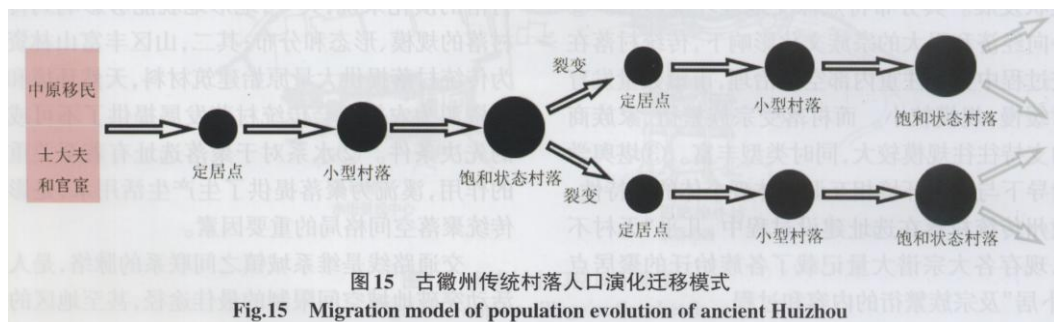
4.1 自然环境与交通区位

古徽州地区处于皖浙、皖赣毗连地带，地形地貌丰富，包括平原、台地、丘陵、山地等多种类型。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其特点就是山多，水系丰沛，但是耕地较少，适合开垦种植的农业用地成为稀缺资源，正是些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古徽州传统村落特有的空间格局。表现在：①山区地形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是居民点初始区位形成的基础。对于传统村落的演化来说，其一，地形地貌能够影响到传统村落的规模、形态和分布；其二，山区丰富山林资源为传统村落提供大量原始建筑材料，天然环境和珍贵资源为农耕社会传统村落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②水系对于聚落选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溪流为聚落提供了生产生活用水，是影响传统聚落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

交通路线是维系城镇之间联系的脉络，是人类活动突破地域空间限制的最佳途径，甚至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与交通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上由于山区丘陵的限制，古徽州地区的交通便捷程度较低、可达性不高，正是这种交流载体的不通畅，使得该地区受外界影响较少，继而形成了地域特色明显的传统村落文化。也正是基于此，该地区的交通组织方式与地形特点紧密结合，以发展水运为主，区域内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流程长，北连长江，东南贯通吴越钱塘，西南达鄱阳湖水域。古徽州地区的背部沿江平原地区及歙县盆地水路发达，能够很好地与外部区域沟通，枝状延伸与腹地沟通，因而这些地区的传统村落多沿流水系分布。在水系难以完全沟通的情况下，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徽商鼎盛，徽州商运繁荣，交通方式亟需进一步拓展，这一时期徽州先人多以青石板修砌在群山峻岭之间形成远远绵长的出境道路，这些串联成线的古道东至苏杭地区，西抵云贵，南到两广，北达南京的商运线路。这些陆路沟通方式，特别是在一些翻山路段，因为商品中转和商旅休憩的需要，因而形成了大量传统村落沿徽杭古道、徽宁古道等沿线分布。甚至在水陆交通转换的地方形成了商贸城镇。

4.2 人口迁移与内部分化

根据古徽州历史文献对传统村落地名的记载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古徽州人口迁移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原南迁的移民迁入，二是宦游徽州和士大夫向往徽州山水，继而举家迁入，三是内部聚落就近分化。南迁的中原世家大族深受封建等级文化的影响，恪守着严密的宗法组织和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南迁和不计其数的局部迁移，多是基于名门望族生存的追求和文化延续的需要，其重要特征是有组织的举族大规模迁移并选择聚族而居。一方面稀释着徽州的人口构成比，并逐渐成为徽州居民主体；另一方面以其完整的宗族结构和先进的文化成为了徽州先民凝聚的精神脊梁。



随着人口不断地繁衍增长，原有的集聚点达到饱和态势，析出过剩人口、开辟新的聚居点成为徽州族人的重要任务，因此

通过宗族祠堂的分支设立以及外姓之间的婚配使得析出口在广袤的徽州地域上实现就近迁移，逐渐演变成星罗棋布的新村落。聚落这种演化如同细胞分裂，新的集聚点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开始新一轮的裂变（图 15），在宗族力量主导下的这种分裂，使得古徽州传统村落之间均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数朝历代社会结构演变，最终形成徽州传统村落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

4.3 徽商经济与徽文化

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传统村落的发展演化。古徽州传统村落的繁荣和经济商业贸易是密不可分的，商品经济是其壮大的前提和条件。明清时期是徽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与徽商的崛起密切相关。徽州山区有着丰富的茶叶、林木等自然资源，许多徽州人依托本地富饶的物产经营起家，徽州的新安江、横江水系更是使得大宗贸易运输成为可能，为徽州商人提供了相对便捷的运输通道。人多地少的现实矛盾、富饶的山林物产激发了徽州人的积极营商的热忱。到明成化、弘治年间，徽人从商风习已成气候，此后四百余年，徽商雄踞全国商界。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徽商积累的财富很难在产业上找到出路，于是形成了“以末致财，以本守土”的社会风气，大量发迹的徽商最终将商业利润流归故土。购置大量土地、兴建寓意光宗耀祖的祠堂、营建极尽奢华的私人府邸园林，将商业利润转变为物质景观呈现在聚落之中，使得古徽州传统村落的发展到鼎盛。此时的村落规划选址与自然环境相结合，宗族血缘依旧是维系村落的纽带，堪輿学说、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等包含的约束与秩序构成村落内在核心，从而形成集美学与适用性于一身的空间组合形式，使古徽州传统村落景观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4.4 自发选择与地域身份认同

“人类聚居学”的开创者道萨迪亚斯指出“人类聚居是为自身所作出的地域安排，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求”^[23]，在这一需求之下，地域作为自发过程中的关键指导因素得以凸显。而一个稳定的聚落必然要求“人一聚落一环境”三者和谐共处。因此，早期中原移民来到古徽州之后，首要任务便是依照自身需求结合所在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开垦农田、修建房屋，于是，徽州地区最早一批聚居村落被动形成。相对于自发性而言，自觉强调了行为的主动性，自觉的社会活动不再是盲目和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出于认同与选择性的行动，行动者需具备对于该行动的基本理解力、目的性和计划性。古徽州先民们在经过了自发的适应和自觉的改造之后，最终获得对这一地区资源利用的主动性。人们在环境选择、建筑位置、田宅关系、生产方式、生活模式等诸多方面达成共识。随着人口不断增多，早期单个的小规模聚居点已经不能满足先民们的生存需要，人们开始依照先前总结的经验，自觉利用和改造自然，建立新的聚居点。传统村落由此通过从自发到自觉的模式演变，形成特有的地域建筑文化。

5 展望

传统村落如生命体一般经历着发生、发展、衰败的持久性复杂性的发展过程，不去了解古徽州传统村落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特征，就无法正确认识古徽州传统村落的现在，更无法合理引导其未来的发展。通过追溯古徽州传统村落发展之源、回顾与分析其空间发展的过程与组织规律，总结其中的演进机制，能科学判断其今后的发展方向。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通过古徽州传统村落演化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在当下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伴随着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对于传统村落的研究不应仅仅限于传统的物质空间，更多的需要关注与之相伴的社会空间研究。传统村落是人们社会活动及其组织方式在空间上的投影所致，即村落空间结构与集聚人群的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对应关联。社会结构的转型必然导致聚落空间的更新。基于这一认知，后续研究需要加强探讨社会结构与村落空间演化的互动耦合关系，进而分析传统村落社会功能更新与村落空间演化趋向，科学提出传统村落活化路径与方法。

参考文献:

[1] 程干, 付俊. 基于游客感知的古村落旅游资源评价研究[J]. 经济地理, 2010, 30(2): 329-333.

-
- [2] 侯晓飞.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研究[D]. 天津:天津商业大学, 2011.
- [3] 杨丽婷, 曾祯. 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综合价值评价研究——以浙江省磐安县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4):112-116, 122.
- [4] 刘昌雪. 世界遗产地旅游推力—引力因素研究——以西递和宏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05(5):15-20.
- [5] 王云才, 郭焕成, 杨丽. 北京市郊区传统村落价值评价及可持续利用模式探讨——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传统村落的调查研究为例[J]. 地理科学, 2006(6):735-742.
- [6] 梁栋栋, 陆林. 古村落型旅游地土地利用的初步研究——世界文化遗产黟县西递案例分析[J]. 经济地理, 2005(4):562-564.
- [7] 车震宇, 保继刚. 市县政策与管理在古村落保护和旅游中的重要性——以黄山市、大理州和丽江市为例[J]. 建筑学报, 2006(12):45-47.
- [8] 崔曙平, 于春, 何培根, 等. 江南文化何所寄——江南的历史流变与苏南乡村空间特色保护的现实路径[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11):60-66.
- [9] 郑霞, 金晓玲, 胡希军. 论传统村落公共交往空间及传承[J]. 经济地理, 2009, 29(5):823-826.
- [10] 洪豆伟, 刘志强. “拆解”与“重组”——基于村落聚居空间自组织机理的撤迁并居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1(5):102-107.
- [11] 孙军涛, 牛俊杰, 张侃侃, 等. 山西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J]. 人文地理, 2017, 32(3):102-107.
- [12] 龚胜生, 李孜沫, 胡娟, 等. 山西省古村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3):416-425.
- [13] 车震宇. 旅游发展中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空间形态演变[J]. 旅游学刊, 2017, 32(1):10-11.
- [14] 孙莹, 肖大威, 徐琛. 梅州客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类型研究[J]. 建筑学报, 2016(S2):32-37.
- [15] 焦胜, 郑志明, 徐峰, 等. 传统村落分布的“边缘化”特征——以湖南省为例[J]. 地理研究, 2016, 35(8):1525-1534.
- [16] 徐会, 赵和生, 刘峰. 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句法研究初探——以南京市固城镇蒋山何家—吴家村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6(1):24-29.
- [17] 陶伟, 陈红叶, 林杰勇. 句法视角下广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认知研究[J]. 地理学报, 2013, 68(2):209-218.
- [18] 牛强. 城市规划 GIS 技术应用指南[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 [19] 李伯华, 尹莎, 刘沛林, 等. 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5, 35(2):189-194.
- [20] 田逢军, 汪忠列. 城市空间意象研究述评与展望[J]. 世界地理研究, 2014, 23(1):84-92.

[21] 杨贵庆, 蔡一凡. 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的自然智慧和社会语义[J]. 上海城市规划, 2016(4):9-16.

[22] 孙莹, 肖大威, 王玉顺. 传统村落之空间句法分析——以梅州客家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5):63-70.

[23] 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 f 导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